



数字媒介对美学法则的重构*

陈定家

摘要:数字浪潮奔涌而至,当代文艺美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印刷术到数字媒介,技术演进犹如大河改道。大数据编织叙事经纬,虚拟现实拓展感知疆域,人工智能重塑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使艺术门类的围墙逐渐消融——电影与游戏联姻,文学与代码共舞,多元审美形态竞相涌现。图像霸权时代,“审美祛魅”成为无法回避的命题。视觉文化的崛起,使文字与图像的关系从和谐走向紧张,又从冲突走向重构。新媒介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审美期待,新技术不仅为人们编织着梦幻般的视觉叙事,而且将观众卷入沉浸式剧场,社交媒体让每个人成为审美主体。跨模态深度学习不断拓宽着审美的边界,互动式体验让美感在参与中绽放,个性化定制推动审美对象走向日常。然而,技术迭代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例如浅薄化在消解着深度,碎片化在撕裂着完整。“越界”与“破圈”不仅是技术驱动的结果,更是美学生命永续发展的源泉。当人工智能技术奇点临近时,传统美学观念正经历根本性重构。唯有以开放心态拥抱这场变革,方能在数字洪流中使美学之树焕发新的生机。

关键词:越界;破圈;图像霸权;跨媒介叙事;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美学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3-0059-12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以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剧、微电影为代表的新媒介文艺形态,正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载体。在数字媒介深度渗透文化领域的当下,算法已不再只是技术层面的运算规则,而是逐渐介入文艺创作、传播与接受的全过程,这一变革促使传统美学观念经历着系统性重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加上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技术的需求旺盛,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纵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

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119}这里的“头雁”效应之喻,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人工智能(AI)不仅是科技革命的引擎,更是激活文化创新潜能、实现审美革新的关键因素,为网络文艺等文化形态的更新提供了战略视野。然而,如何在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中,将“头雁”效应切实转化为网络文艺的创新动能与审美实践,使其既回应技术变革的挑战,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亟待深化的时代课题。

一、新媒介文艺的“越界”与“破圈”

从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看,文艺的每一次重大的变革和进步都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密不

收稿日期:2026-0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遗产与海外传播研究”(21&ZD265)。

作者简介:陈定家,男,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江西南昌 33003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媒介研究。

可分,几乎每一种新艺术形式的产生都以某种新技术的问世为基础。“印刷的发明,使士大夫的诗文得以大量刊印和广泛流布与腾播,使社会拥有图书的人数大大增加。在西方由印刷引起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复兴的产生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知识冲破教会的束缚走向平民,文艺从王公贵族的庭院走向大众。实际上,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印刷术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2]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印刷术具有连续性、同一性和可重复性的特点,可重复性使印刷的书籍比缮写的书籍价格更便宜、更便于携带,同一性使职业文人应运而生,连续性使作家能够尽情地表情达意。印刷术“造成诗与歌、散文与讲演本、大众言语与有教养的言语的分离”^[3],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生产方式。印刷术不仅造就了成功的出版商、培养出第一批职业小说家,而且对音乐、美术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人类文明演进与科技革新的双重驱动下,昔日依托纸张、以静态方式传递信息的印刷媒介,已难以契合现代生活瞬息万变的节奏与需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兴传播形态陆续登场。百余年来,广播、电影、电视相继问世,一次又一次对曾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印刷媒体发起强势挑战,逐步解构其长期垄断的话语霸权。然而,真正令印刷媒介地位遭遇根本性动摇的,还是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与普及。

日本早有学者大胆预言“铅字消失”,认为以纸张为载体的书籍或将走向终结。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亦在《第三次浪潮》中断言,即便某些词语仍会存续,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书”这一形态,却极有可能逐步消亡。20世纪末,电子出版浪潮席卷书刊市场,开始强势分流信息源头与受众群体。相较于传统印刷出版物,电子出版物呈现出立体多维、互动鲜活的崭新面貌。其人机交互与智能检索功能,使读者在接收信息时从被动走向主动,有力地激发了读者的参与感、探索欲与创造性。多媒体电子出版将文字、影像、声音、图形融为一体,声色并茂、意趣横生,既提升了阅读体验的沉浸感,也大幅拓展了信息获取的广度与深度。其外形纤巧、容量

巨大、操作便捷、携带方便、查询迅速,无论是从技术形态还是从传播效能来看,都堪称出版业一场深远的范式革命,这必然引发艺术生产方式的结构转型。

20世纪90年代初,在电视媒介大行其道之时,日本讲谈社却出版《电视的消失》一书。书中预言,今后将是“电视电脑”的时代,光缆把全世界的电脑连接起来。与电视的单向式传播不同,它能够像电话一样进行双向式传输。如同在语言的传送中电话胜过了电报一样,在图像的传送中“电视电脑”也将完全超过电视,到21世纪全世界的信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在“电视电脑”上得到^①。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学者稻见昌彦提出了令人脑洞大开的“时光机”和“任意门”的设想:当我们拉开书桌的抽屉时,“时光机”就可以使我们穿越到任何时代;当我们打开“任意门”时,就能实现瞬间移动,抵达任何地方。“想必有不少读者见到秘密道具时,就忍不住想‘要是我有这么个东西就好了’。这部漫画(指《哆啦A梦》)里有一种‘记忆面包’,可以拓印书本上所写的内容,并让吃下面包的人牢牢记住。而到了现代,只要拥有智能手机,就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记忆力的增强。尽管实施方式有差别,不过类似的技术愿景的确正在逐渐变成现实。”^[4]他还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像《哆啦A梦》中的主人公一样,带着竹蜻蜓翱翔于天际,像《哈利·波特》中的主人公一样穿上斗篷变身隐形人……这种近乎科幻小说的想象,从一个感性化视角形象化地折射出新媒介文艺在审美实践中不断“越界”“破圈”的巨大潜力。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观视野审视,信息传递与存储方式的嬗变,构成了一部独特的科技编年史。从结绳为契、刻木为符,到甲骨兽皮上的刻画、描摹;从布帛、竹简的手工缮写,到活字排版的批量复制,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与改造所凝结的智慧,日渐以更加真切、具象、高效的图文形态得以延续。进入现当代,书刊印刷由铅字排版的“铅火时代”发展到激光照排的“光电时代”,写作方式也从执笔构思转变为键盘录入、网络传输。今人在思想表达与信息交换上的迅捷与精准,已远超先辈的想象极限。今天,

互联网如血脉般嵌入我们的生活肌理,信息高速公路所输送的,远不止技术本身,而是一种以信息为核心的全新认知框架与生存范式。足不出户而遍览天下,已不再是虚妄的神话。今天,神奇的网络正在将全球的众生联结起来。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比任何神话都更加奇妙而真切。

诚如尼葛洛庞帝所言,在传统社会格局中,人际的物质交往依托于原子的交换。人们以缓慢、艰辛、代价高昂的方式,将沉重的、缺乏生机的“质量”即“原子”在时间与汗水的消耗中辗转搬运,无可奈何地消磨着金钱与生命。而如今,大数据、云存储等以“比特”为内核的技术力量,正将人类智慧从“原子”的层层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启了信息流通的新纪元。尼葛洛庞帝宣称:“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地球这个数字化的行星在人们的感受中,会变得仿佛只有针尖般大小。……当你从视窗中向外眺望时,你也许可以看到距离5000英里和6个时区以外的景象,你观看的电视节目长达1小时,但把它传送到你家中所需的时间也许不到1秒钟。阅读有关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材料时,你会体验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你一边欣赏威廉·巴克利的作品,一边可能和作者直接对话。”^[5]

新媒体技术所牵引的这场变革,其深度、广度与彻底性将超越既往任何一次媒介变革。形态万千的网络文艺,凭借数字化编码、多感官融合与双向交互的传播特质,为受众营造出一方宛若漫游于数字市集般的自由空间。人们不仅可以按需择取心仪的内容,还能随时发声点评;兴之所至,人们还可以将作品下载至个人终端,在私人屏幕上依循个人审美偏好再度创作,甚至重构原貌。在这个平台上,只要恪守法律与公序良俗,每一位网民都有可能成为潜藏的文艺创作者,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分享、传播。新媒介文艺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跨越时空的即时互动与便捷参与,归根结底,是技术逻辑的内在驱动使然。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

是要消失吗?”^[6]在他看来,希腊神话及其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是无法与自动纺机、铁路、机车和电报共存于同一时空的,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无处栖身。过去,我们往往将这段话解读为艺术生产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关系——这一理解无疑切中肯綮,但也暗藏着一丝怅然。技术的更迭,不仅仅是工具的演进,更是一场对想象力与美感形态的深层重塑。

现代传媒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文学与文化的“必要条件”,包括文艺写作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7]由此可见,新媒介不仅在政治宣传阵地、市场经济战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文化文艺前沿甚至审美观念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今,科技迭代的加速度正在将文艺置于前所未有的算法透镜之下。媒介技术的演进,不仅重塑了文艺的表现手法,更在重构创作与接受机制的同时,从根本上动摇了“作者何为”“文本何义”等经典命题的认知根基。在算法生成内容广泛渗透的背景下,新媒介文艺不再仅仅是品牌传播的工具,而已经演变为一种人机协同的审美实验场。驱动这场审美法则重构的核心技术要素,如生成式预训练模型、多模态算法、扩散机制、提示词工程等,正以基础设施的形态,嵌入当代文艺的生产体系,对其生态格局与演化方向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网络文艺创作正在步入指数级跃升的发展轨道。在海量输出、瞬时迭代、风格迁移等技术赋权之下,“创作”这一曾经专属人类的智识活动,正在被重新定义。与此同时,文艺理论尤其是美学观念也产生剧烈震荡。在全球化交融、技术奇点临近、多元文化互渗的宏观语境中,当代美学正经历着一场根基性的解构与重构,“跨界”与“破圈”正是这一复杂进程的核心驱动力。这不仅

关乎艺术门类之间的技术性融合,更意味着人机共创时代审美规则的大幅度改写。当算法深度介入艺术与现实对话时,由此催生的美学嬗变使文艺创作与大众接受突破了各种陈旧规则的藩篱,实现了对传统审美观念既有边界的系统性跨越。当生成式AI将创作门槛降至“人人可及”的水准时,日常生活流与技术生成物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在此背景下,这种挣脱传统范式的“越界”与“破圈”现象,便愈发具有标志性意义。

首先,在生成式AI的介入下,文艺创作在开掘传统题材的同时,获得了介入现实语境的全新方式,并重点聚焦于社会热点、算法伦理、技术奇点等议题。经由人机协同的艺术转化,这些现实素材被赋予多模态呈现的可能性,成为映照时代精神、叩问技术与人性的重要载体。AI科幻叙事与算法生成影像的勃兴,便是文艺创作对技术迭代做出的敏锐反应。与此同时,艺术门类之间的跨界融合亦构成算法时代美学“越界”的醒目景观。音乐与图像的AI协同生成、戏剧与虚拟现实的沉浸互渗、文学与算法的交互叙事……层出不穷的融合实践,不仅刷新了艺术的表达维度,更在不同媒介之间催生出新型的审美关系,孕育出人机共生的艺术生态。

其次,文艺生产与消费领域的“破圈”效应,正借由生成式AI的力量被推向极致,相关学术研究亦为算法时代的美学疆域拓展贡献了关键智识。若将“越界”视为创作层面的内生变革,那么“破圈”则意味着在算法赋能下文艺外部辐射力的几何级扩张,表征着文化传播版图的深度重构。这种“破圈”效应源于多重力量的交会:大模型的涌现能力、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用户生成内容的社群裂变,三者缺一不可。生成式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彻底重塑了文艺作品的创作机制、传播路径与接受方式。文艺不再受限于物理空间乃至人类的创意边界,而能以“算法分发”的形式瞬时触达全球受众,实现跨地域、跨文化的深度流通。这种“破圈”效应不仅大幅扩容了受众群体,而且催生出算法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

社交媒体与AI创作工具的深度耦合,更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互动空间与内容生产渠

道。人类创作者与AI生成系统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人机共创的社群关系愈趋紧密;用户生成内容与算法推荐的叠加效应,甚至使一些边缘、小众的文艺形态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这种“破圈”现象不仅激活了文艺市场,也助推了算法时代文化消费的结构升级。

最后,“越界”与“破圈”既是算法时代美学的必然走向,更是其生命活力的内在源泉。它们不仅借助生成式AI丰富了文艺创作的题材与表现形式,拓宽了文化传播的边界,更在深层重塑了人们的审美感知、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越界”与“破圈”激励创作者勇于实验、敢于突破,持续挣脱传统程式的束缚,探寻人机协同的新型艺术语汇与表达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创新精神,正是推动算法时代美学不断演进的持久动能。在全球化语境下,“越界”与“破圈”既有助于我们吸纳外来文化养分,也能促进本土文化在算法时代的传播与彰显。通过人机共创的文化对话与互鉴,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辨识自身文化的根基与独特价值,从而在技术浪潮中坚定文化自信。文艺作为人类共同的语言,其在算法时代的“越界”与“破圈”进程,亦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历程。经由AI赋能的文艺作品流通与对话,我们得以增进彼此的了解与情感联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技术赋能的文化资源。

毋庸置疑,生成式AI所驱动的美学“越界”与“破圈”正引发一场深刻变革,展现着文艺创作的无限潜能与文化传播的广阔前景。这一时代的美学,正以更开放的技术姿态、更创新的生成思维、更包容的人机胸怀,书写属于当下的华彩篇章。尤其是在基础理论层面,随着“越界”与“破圈”成为主流趋势,诸多重要命题得到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成果。例如“文图关系”这一经典命题,在生成式AI的多模态转向中获得了全新的理论生长点——当文字提示与生成图像之间的映射关系成为常态时,当“词与物”的古老张力在算法层面被重新激活时,这一看似陈旧却常谈常新的话题,在近10年间取得了无愧于算法时代的学术硕果。

二、“图像霸权”语境中的 “审美祛魅”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是人类审美长河中绵延不绝的母题。在古今中外的史料与典籍中,相关论述时有所见。“当我们对其进行了文化、社会、心理、传媒学意义上的诸般解读后深刻地体会到‘读图’确实代表一个新的时代。人们亲身经历的艺术体验表明我们已经进入‘读图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变成‘图像化生存’。”^[8]研究者指出,在当今的学术学科体系中,对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梳理与考察,不仅会推动各自领域的研究,也会促进我们对整个人文思想体系和人类社会活动的理解。然而,这场关于“文图关系”的学术追问,虽因其枢纽性的理论位置而备受瞩目,却也因涉及跨学科的诸多深水区问题,令不少学者望而却步。

文学图像作为独立领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学界,我国的相关研究则晚20余年。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10年后,“文学与图像”问题才高调进入学者视野,很快呈现出蓬勃生机,现已扩展至哲学与美学、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等诸多论域,堪称新时代的新兴显学。就内容而言,目前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以理论为主。这一类型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除赵宪章的“文学图像论”外,还有一些博士论文、图像理论译介,以及借鉴现象学和存在论方面的尝试。二是以历史为主。这一类型的研究者较多,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和艺术史,包括通史、断代史以及文艺史上的各种“文图现象”研究,着重探讨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历史演变。三是个案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作家或画家专题研究、名著插图专题研究、民间文艺中的“文图关系”研究、语文和艺术教育中的文图研究、历代蒙学作品中的文图研究等。

在这一学术图景的拓展进程中,赵宪章的研究值得称道,其《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10册)堪称里程碑式的奠基之作。这套著作受到专业研究者的广泛好评,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

主要参考文献。“该著参照文学史分期,着眼于各期与文学相关的神话传说图像、书法图像、诗意图、小说插图、曲本插图、连环图画等,简明勾勒了先秦至民国时期文学图像的演进脉络。”^[9]北京大学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团队,是以陈明教授为主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该团队围绕“东方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已经探索、攻关数年,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成果。他们指导的研究生中,有很多论文选题被吸引到这一领域。陈明团队有着明确的研究目标和发展设想,长期在该领域深耕细作。他们的研究不仅使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面目焕然一新,而且为整个中外文学研究探索出一条跨学科的新路径。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同样引人瞩目。他的研究材料翔实,注重细节,善于以小见大,颇具功力。东南大学龙迪勇教授的空间叙事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目前转向了跨媒介叙事,这属于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近邻”。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青年学者对“文学与图像”情有独钟,使得整个研究队伍充满希望与活力^[10]。

然而,上述关于语图关系的重要论述,如今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具有本体论冲击力的技术变量——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智能媒介。这股力量正以磅礴之势重塑大众审美文化的肌理与面貌,使美学的学科边界遭遇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冲击:观念在被算法不断刷新,内涵在向多模态扩容,领地在人机交互间延展,疆域正向无边的虚拟世界爆炸式拓展。由此引发的美学范式转型,已然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前沿议题。《中州学刊》早在2010年第2期便组织刊发了“数字媒介与美学边界”研究笔谈,围绕图文关系展开深入系统的学理探讨。据主持人欧阳友权介绍,这组笔谈分别从“读图文化转向”、“文学代际变迁”、“纸媒与新媒体叠加共生”、文学批评的尺度设定等维度,剖析了数字媒介语境下美学内涵与边界嬗变的必然逻辑与可能路径。其中提出的一系列基础性学理问题,在生成式AI深度介入文艺创作的今天,愈发显示出前瞻性的理论价值。譬如,当算法生成的图像洪流与文字表意的传统阵地形成力量悬殊的对峙,美学如何在人机共创的博弈格局中

赢得自身的生长空间?当生成式AI对“文学千年帝国”造成近乎大河改道式的结构性冲击时,人文审美又该如何在这个被“景观社会”与技术奇点双重裹挟的时代重建属于“后文学时代”的理论自信?当AI生成文本大举挺进文坛时,我们是否需要彻底调整精英主义的思维定式,以建构更具现实阐释力的算法时代美学观念,进而重新审视那些被反复叩问的“逻各斯命题”?数字化时代文艺批评的伦理尺度与审美尺度,又该以何种方式确立,才能支撑起新技术语境下文学的价值天空?或许这组笔谈未能彻底解答所有疑问,但几位学人在10多年前便以积极的理论姿态提出并直面这些问题,为人们理解算法时代的美学重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进入新时代,学者们对文学图像化问题的关注愈发深切,甚至流露出某种忧思。有论者指出,我们已然栖居于一个由“图像”“拟像”和“类像”编织而成的“景观社会”。伴随社会“文化转型”而来的“图像转向”,早已是不可逆转的经验事实。人们一面惊叹于图像、影像带来的视觉盛宴与感官冲击,一面又不免为传统文学的生存境遇暗自担忧;一面沉醉于技术赋能的视觉新体验,一面又慨叹文字叙事模式的渐行渐远。可以说,一场围绕图像时代的图文之争,在西方学界率先展开,并迅速蔓延为全球性的学术焦点^[11]。还有人认为,图像时代的降临催生了新的文学类型,也从根本上改写了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动态关系。从纸质文本的一统天下,到图文互渗的复合文本,再到自媒体视频中图像的独立叙事,文学与图像的天平似乎正朝着越来越不利于文学的方向倾斜^[12]。

图像时代的文学变异,以及随之而来的视觉化阅读对文字阅读的压倒性胜利,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文学与图像在算法时代的新型关系。当前生成式AI能够瞬间完成图文转换时,多模态模型可以随意调用视觉语汇编织叙事,这场古老的图文博弈正被注入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量,由此也呼唤着与之匹配的美学阐释框架。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下的中国,视觉的盛宴如浪潮一般向我们倾泻而来,几乎渗透到个体生存的每一处空间。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

作为构成社会最小细胞的个体,其职责不仅在于抵抗视觉的奇观化倾向,抵抗视觉文化的肤浅与失度,更在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意识。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非常密切,学界的关注也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图像时代”对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今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负面影响的背后,潜藏着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正如赵宪章所言:“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主要的两种表意符号,传统的唱和关系、和谐关系已被‘图像时代’所颠覆;包括文学在内(文学较为典型),原是语言的领地,正被图像所替代、所僭越,例如影视改编对文学阅读的替代与僭越。”“图像对语言的替代与僭越不但不会止步,而且会呈现一往无前的强势,并且会愈来愈强势。”^[13]文学与图像、“语象”与“图像”的比较分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

随着视觉文化的盛行,电影、电视、录像、网络以及形形色色的广告牌中的图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正如陆扬所指出的:“视觉文化正在占领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曾被哲学视为幻相的图像,还是通过符号表情达意的文字,我们的视觉对象从形象、图像、书本,在向电脑屏幕转移,进而在向手机屏幕转移。它带来无数的方便快捷,让我们易如反掌运筹帷幄,不出户门尽得天下,以及其他种种数说不尽的好处。但是它的一个无可救药的副作用,是导致我们的视力,我们的眼睛,我们视觉本身的生理结构,在日渐恶化。这意味着感性的权利过度伸张下来,势必将导致感觉自身的退化。这个文明进步的悖论,无论如何是意义深远的。”^[14]

在语图关系的学术视域中,语言与图像的纠葛始终处于动态演化之中。现代视觉艺术以图像为主导的表意路径,使语图关系趋于紧张,而由此衍生的“图像霸权”论调,其深层则潜藏着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15]。然而,单凭视觉文本的单一表意模式终究难以自足,这种局限性恰恰推动了语言叙事与图像叙事在体例上的弥合与一体化进程。现代视觉文本所具备的跨语境表意机制、指涉范围的持续扩张、图像表意动态性的不断增强,以及审美认知图式的深

刻嬗变,为我们在视觉文化语境中重新厘定语图关系提供了更为丰赡的理性资源。生成式AI的出现,则将这种一体化进程推向了极致——它不再仅仅是两种符号系统的简单叠加或转换,而是在底层算法逻辑中实现了语图符号的深度耦合。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理解语言提示与生成视觉内容,这意味着人类数千年来赖以构建文明大厦的两大符号系统,首次在机器智能的“黑箱”中完成了底层通约。传统美学中关于“语图边界”的一切争论,在算法面前被彻底消解为可计算的向量关系。

另有研究者将图像视为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认为图像是人类接收与传播讯息的重要媒介。经过编码的图像,往往被注入特定的思想观点与价值理念,因而潜藏着意识形态的传播功能。这种编码图像不仅传递“是什么”的事实性知识,更隐含着“为什么”“要怎样”的价值导向。当前,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路径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西方媒介凭借技术优势,不断向中国实施图像化的意识形态渗透,致使图像信息传播领域存在不少乱象。为此,有论者指出,唯有科学把握图像传播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方能精准切入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传播的关键节点^[16]。而在生成式AI时代,图像的意识形态生产逻辑正在经历根本性的重构:图像不再仅仅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编码载体,算法自身的偏见、训练数据的分布偏差、提示词工程中的潜在诱导等,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隐蔽方式参与审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图像传播的“编码—解码”模型,正在被“人—机—社会”三元互构的复杂系统所取代,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图像化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众所周知,图像与文字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媒介,其符号特性判然有别。龙迪勇曾指出,在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图像叙事往往并非对生活事件的直接模仿,而是对语词叙事已然讲述的故事进行再度模仿。就模仿与媒介的关系而言,既存在“本位”现象,亦存在“出位”现象——前者强调模仿须恪守媒介自身的规定性;后者则强调模仿时既要遵循媒介特性,又要试图跨越自身边界,去追寻他种媒介的美学效果。“跨媒介叙事”中的“跨”,正是超越自身作品

及其构成媒介的本性或强项,去创构本不属于自身的优势而属于他种文艺或媒介特质的叙事形式^[17]。

回溯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书籍封面的设计、文学作品的连环画改编与电影改编等实践中,我们均可发现文字媒介向图像媒介的转换轨迹。对新文学作家而言,封面设计既承载着作品内容的传达与创作意图的彰显,亦是传递启蒙思想的途径之一。不少现代文学作品在当时便被改编为连环画,这种改编既是对文学经典性的阐释,也深度参与了文学经典的建构进程。然而,生成式AI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跨媒介叙事”的技术条件。当AI能够根据一段文字描述直接生成风格、构图、光影俱佳的高清晰度图像时,传统意义上需要艺术家耗费大量心智劳动才能完成的“跨媒介转换”,已被压缩为毫秒级完成的算法运算。媒介“出位”不再需要艺术家穷尽心力去追求他种媒介的美学效果——算法可以直接“合成”这种效果。这不仅意味着艺术创作效率的指数级提升,更深刻地动摇了传统美学关于“创作主体”“艺术意志”“媒介抵抗”等一系列核心范畴的理论根基。当图像不再是对故事的“再度模仿”,而是与语言叙事同步生成甚至超前生成时,文学与图像的时间性关系被彻底重构,一种“算法中介的即时互文性”正在形成。

进入读图时代,不少网民因媒介素养匮乏而深陷上网成瘾、上当受骗甚至更为极端的困境。这一现象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图像与观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研究者警示:“数字技术带来了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变革,也重构了图像与现实。网络虚拟呈现的多元化和‘拟像’消费正以各种方式开疆拓土,如果网民不能受到良好的媒介素养教育,图像化生存和网络化生活将成为他们的梦魇。”^[18]此言切中肯綮,发人深思。在图像霸权日盛的新媒介语境下,提升文艺素养、涵育审美精神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在生成式AI深度介入日常审美体验的今天,“媒介素养”的内涵必须再次扩容。我们不仅要学会解读图像,更要学会与算法对话;不仅要警惕图像的意识形态陷阱,更要洞察生成式模型背后的数据偏见与价值预设;不仅要坚守

文艺的审美精神,更要在人机共创的审美实践中重新确定人的主体性位置。当算法可以无限趋近甚至在局部超越人类的审美判断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追问:在“美”被AI批量生产的时代,人究竟还能为审美贡献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恰恰潜藏在“审美祛魅”的终点——当一切关于美的技法、规则、风格都被算法解构为可计算的数据时,真正的美学重构,将始于我们对那些不可计算之物的重新发现。

三、新媒介何以改变审美期待

进入新世纪,“背靠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GAFA)等科技巨头的平台成为文化生产的基本单位。平台与传统社会互嵌,塑造了无远弗届的平台社会,推动了公共空间的平台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演化,ChatGPT和Sora等大模型也正在从技术工具向平台转变,这一平台化进程也是人工智能大众化的实践”^[19]。早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已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已突破了‘不能用,不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拐点,进入了爆发式增长的时期。”“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建构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140}

2026年2月12日,字节跳动的Seedance 2.0横空出世,这款音视频创作模型支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四大模态输入,在多模态内容参考与逻辑理解能力方面具有行业领先优势。几个月之前,OpenAI的Sora 2以“物理世界模拟器”的姿态,将视频生成推向“完全符合物理学规律”的新高度。2026年3月25日,OpenAI因发展战略调整,宣布关停Sora。虽然Sora从封神到退场,仅仅25个月,但其短暂的技术探索历程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研究价值的参照对象。

就美学意义而言,两大模型的短兵相接,标志着人工智能从“能否生成”的技术验证,迈入“如何生成”“为何生成”的美学追问。这场变革的深刻性,远非“创作效率提升”所能概括。当Sora致力于“让世界相信视频可以是假的”,Seedance 2.0致力于“让创作者相信假视频可以

是作品”时,数字媒介对美学观念的影响,已经从工具性渗透转向本体性重构。文艺遭遇算法的时刻,不是人类主体与技术客体的简单相遇,而是一场涉及创作主体、审美对象、感知方式与价值坐标的深度重组。我们需要从本体论转向、创作主体重构、美学政治学三个维度,阐释数字媒介如何重塑当代美学观念,并尝试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算法日益成为“共谋者”的时代,审美判断力的独立何以可能?

(一)本体论转向:从“真实记录”到“可能世界”

Sora与Seedance 2.0的技术分野,折射出对“视频本体”的根本性分歧。杨立昆将Sora及其同类产品斥为“像素幻觉”,因其本质是“数据驱动的风格模仿”^②,而非对物理规律的真正理解。这一批判切中要害:Sora 2追求的是对物理世界的完全模拟——重力、光影、碰撞的“真实性”,其技术路径是让AI学会物理学的“语法规则”,从而生成符合人类经验的视觉内容。Seedance 2.0则开辟了另一条道路。相关评测显示,Seedance 2.0实现了“多模态参考”“原生叙事”“工业级一致性”三重突破,其目标不是模拟世界,而是“对叙事逻辑的导演”。换言之,Seedance 2.0关心的不是“视频是否符合物理规律”,而是“视频是否具备叙事感染力”,即人物形象在多镜头切换中的一致性、音画同步的毫秒级精度、分镜脚本的自动化生成。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核心诉求:让AI生成的视频“看起来像作品”,而非“看起来像真的”^[20]。

这一差异的哲学意蕴值得深挖。传统影像美学建立在“索引性”基础上——罗兰·巴特在《明室》中强调,摄影的本质是“过去曾在”的证明,影像与拍摄对象之间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指涉关系。Sora的“文生视频”已然打破了这一关系:它生成的画面从未在现实中存在,却因其“物理准确性”而获得某种“似真性”。Seedance 2.0则更进一步:它生成的不是“可能真实”的世界,而是“符合叙事逻辑”的世界。“贾樟柯用Seedance 2.0打造了一部贺岁短片《贾科长Dance》,他表示,看到画面里两个‘贾樟柯’对话,有种奇妙的穿越感。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胶片到数码,电影用了很多年。每一

次变化,都伴随着怀疑和不安。但AI的发展却如此迅速,从几年前的‘一眼假’,到今天,可以一句话生成一段完成度相当不错的视频,真的很快。”^[21]

在这里,真实性的参照系从物理现实转向叙事惯例,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自治。鲍德里亚提出,拟像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仿造”(counterfeit),工业时代的“生产”(production),再到受代码支配的“仿真”(simulation)。Sora 2与Seedance 2.0的出现,大致可视为拟像的第四阶段——“叙事性拟像”。因为其不再模仿现实,甚至不再“仿真”,而是直接调用人类数千年积累的叙事语法,生成“比真实更符合故事逻辑”的视觉内容。例如,测试者上传一张人脸照片,Seedance 2.0不仅能生成该人物的动态视频,还能“使用他的声音说话”。这已不是对“真实人物”的模仿,而是对“人物可被识别”这一叙事惯例的满足——形象一致性服务于叙事连贯性,而非真实性承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Seedance 2.0生成的“电影级”短片,在手机用户的“真实”观感上已足以与好莱坞大片相媲美,这种“真实”是叙事层面的真实,是符合观众审美预期的真实。

这一转向标志着美学范式的根本位移。传统美学建立在“再现”(representation)基础上。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表现或重构,审美判断的核心在于“与现实的关系”。即使是现代主义的“自律性美学”,也以否定再现为前提,其参照系仍然是那个被否定的现实。Sora与Seedance 2.0共同开启的则是“生成美学”(generative aesthetics)时代。在这里,艺术作品不再“再现”某个先在的现实,而是“生成”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合法性依据,不是它与外部现实的符合程度,而是其内部的自治性、丰富性与感染力。Sora的“物理模拟”与Seedance 2.0的“叙事导演”,可以视为“生成美学”的两种子类型:前者生成符合物理规律的可能世界,后者生成符合叙事逻辑的可能世界。

这种转向彻底取消了“原型”的优先地位,具有一定的激进性。在传统美学中,无论艺术如何变形、抽象,总有一个“原初现实”作为参照系。而在“生成美学”中,作品本身就是“原

型”——它不指涉任何外在现实,只指涉自身。这正如冯骥所言,Seedance 2.0的意义在于“让创作者相信假视频可以是作品”——作品性的确立不再依赖其与现实的关联,而是依赖其内在的叙事完整性。

(二)创作主体重构:“有限作者”的诞生与异化

文生视频模型的出现,彻底改写了创作主体的身份结构。徐杰的研究指出,在Sora时代,电影创作者分裂为三种艺术主体:“有限写作者”(提供提示词的人类)、“人工智能”(生成影像的智能主体)和“导演”(坚持传统拍摄模式的人类作者)^[22]。这一划分极具洞见:它揭示了AI时代创作主体不再是单一实体,而是人机协作的复合结构。其中,“有限写作者”概念的提出尤为关键。从表面上看,“人人皆可当导演”的时代已然来临,使用者输入一段文字即可生成视频,创作门槛降至历史最低。但正如徐杰所言,“提示词”的作者并不能操控影像的生成,他只是“要求”创造影像,而非“亲手”创造影像。这就好比向画家定制画作:发出请求的人不是画家,真正的创作者是那个执笔作画的人。循此逻辑,人工智能电影的真正作者是人工智能体,人类只是在智能主体生成的无数影像中扮演“订稿者”与“定稿者”的角色。

Seedance 2.0的实践印证了这一判断。周鹏的体验是:“随便找几张图,花十分钟”,就能完成以前几个小时的工作^[23]。这里的“创作”,本质上是对AI生成结果的选择、组合与微调,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从无到有”。AI代理(agent)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它将创作者近乎白话的提示词进行再加工,“用模型更能理解的语言作为输入”,这意味着即便是“提示词写作”这个人类最后的领地,也在被算法悄然“殖民”。

关于AI时代的创造力,存在一种主导叙事: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认知特质,而AI可以“扩展”“增强”甚至“自动化”这种特质。Chow与CelisBueno的研究揭穿了这一神话:这种叙事“仅仅是为了掩盖创造力的物质性、网络性和关系性本质”^[24]。换言之,创造力从来不是孤立的人类心灵的产物,而是一种植根于社会关系、技

术网络和物质实践中的分布式能力。

这一批判性视角对理解 AI 美学至关重要。当 Sora 声称能够“自动”完成分镜设计时，当 Seedance 2.0 承诺“将创作者从分镜焦虑中解放”出来时，它们实际上在做的是将创作实践的物质性要素（如摄影机的操作、剪辑的手工、声音的混录等）转化为可被算法调用的“服务”。创造力的“去人化”与“再物质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传统的“人作为创造主体”被消解；另一方面，创造力被重新理解为算法、数据、算力与人类指令之间的网络化效应。但是，这会带来一个根本性的悖论：技术的赋权与人的贬值同步发生。用户周鹏的感慨极具代表性：“按每分钟视频来算，半年前我接商单的单价是一万元，现在最高的能做到七万元”^[23]，但他同时担忧，“这个价格保不住太久，因为工具的更新让创作者逐渐丢失价值”^[23]。当创作的核心环节被算法接管时，人类的贡献被压缩为“创意”与“选择”——而这两者本身也在被算法反向塑造：“在使用图片生成 AI 的过程中，我常常对小说中的场景有新的理解，乃至发现了小说可能具有的新层次。”^[22]这时，不是人在使用工具，而是工具在重塑人的思维方式。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语言——这个被认为最能体现人类精神存在的领地——正在经历技术的异化。Sora 生成的视频所对应的“提示词”，往往包含“无人机视角”“特写镜头”“景深”等摄影术语。这些术语的使用折射出语言对影像的贴合性：真正精到的文学语言未必能生成好视频，符合 AI 图像理解程序的语言才是“好的语言”，徐杰称之为“语言对影像的俯就”^[22]。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逆转：不是图像服务于语言的阐释，而是语言服务于图像的生成。罗兰·巴特曾预言，语言文本将成为阐释图像的附庸。如今这一预言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应验——在文生视频模型中，语言被工具化为生成图像的指令集，其多义性、模糊性、含蓄性被精确性、直指性、规则性所取代。《红楼梦》被生成式人工智能转译为影像的例子极具说服力。用户让 Sora 将“林黛玉进贾府”转译为影像，王熙凤的外貌描写（“头上的珠钗”“项上的璎珞圈”）或许能被忠实呈现，但林黛玉的“似蹙非蹙胃烟眉”“似喜非

喜含情目”如何视觉化？更何况“娇花照水”的闲静、“弱柳扶风”的身姿，这些属于文学语言的独特审美性，在臣服于影像的过程中被消磨殆尽。语言对影像的俯就，本质上是语言的诗性向图像的技术性的俯就^[22]。

（三）美学政治学：算法如何塑造我们的审美

Sora 引领的跨模态对齐，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对感知方式的重组。有研究者指出，Sora 通过建立“跨模态的联觉机制”，培育了一种“连接媒介与身体的技术美学”^[19]。这一判断点明了 AI 美学的核心特征：它不再局限于单一感官，而是通过多模态对齐，直接作用于人的整体知觉系统。Seedance 2.0 的“双分支扩散变换器架构”实现了视频与音频的联合生成：飞驰汽车的轮胎特写配有引擎轰鸣声，人物口型与台词达到毫秒级对齐。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后期配音”，而是在训练阶段实现的“视觉与听觉信号的深度融合”^[23]。其结果是一种“同步生长”的联觉体验：画面与声音不再是分离的感官输入，而是在生成过程中被预先绑定的感知单元。

然而，这种多模态联觉体验的丰富性，掩盖了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算法的推荐机制正在塑造新的审美茧房。算法通过“个性化推送”与“数据化评价体系”重塑图像价值认知，既可能建构“视觉共同体”，也可能形成“符号茧房”^[25]。在 Seedance 2.0 时代，这一问题的负面影响也在与日俱增。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参考素材，“精准复现导演意图”。这意味着“风格”可以被算法学习、复制和组合。用户保存短视频平台的爆款转场视频，利用 Seedance 2.0 将“自己的人脸贴上去”，“就能轻松复制爆款转场”^[23]。这在实现创作民主化的同时，也会带来风格的模板化与同质化的问题：当每个人都能复现爆款的视觉风格时，爆款的泛滥恰恰导致风格的死亡。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算法推荐的“效率逻辑”正在与资本的“流量逻辑”合谋。那些追求眼球效应、迎合感官刺激的内容，借助算法的推波助澜，远比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更容易占据流量高地。李松的研究揭示了这一机制背后的“技术霸权”与“资本操控”——审美判断的尺度在无意识中被拉低，艺术的深层价值被浅表的

快感所稀释。Sora 与 Seedance 2.0 共同制造的“超真实”困境,构成了当代美学的另一个核心议题。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在这里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当 AI 生成的视频与真实视频在感官层面无法区分时,“真实与否”的判断便失去了依据。Sora 2 与 Seedance 2.0 的问世将这一困境推向极致。有评论将 AI 制造的“超真实”景观称为体现人类内心所向往的“完美真实”,但这种“完美真实”带来的后果使人们“眼见为实”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影像记录的事实已不再被坚信不疑。当“真实”可以被如此轻易地伪造时,千百年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信任基石将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

总之,Sora 与 Seedance 2.0 的相遇,不是技术竞赛的偶然交会,而是美学范式转型的必然产物。从“真实记录”到“可能世界”的本体论转向,从“导演”到“有限写作者”的主体重构,从“视觉中心”到“联觉重组”的感知重组——这一切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当文艺遭遇算法时,美学观念正在经历自摄影术发明以来最深刻的变革。

结 语

数字媒介对美学法则的重构,是一场涉及本体论、创作主体与感知方式的深层范式转换。从印刷术到生成式 AI,技术演进如大河改道,在冲击传统美学的同时,也不断孕育出新的审美形态。“越界”与“破圈”不仅是技术驱动的结果,更是美学生命永续发展的内在源泉。当算法能够模拟物理规律、编织叙事逻辑、复刻风格语调时,艺术的门类围墙轰然倒塌,文学与代码共舞,电影与游戏联姻,多元审美形态竞相涌现。然而,图像霸权时代的“审美祛魅”、算法推荐与流量逻辑的合谋,以及 AI 生成的“超真实”景观,也使传统美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然而,变革不等于终结。算法可以生成“符合物理规律”的视频,可以完成“叙事逻辑自洽”的分镜,可以“复刻”任何风格、任何声音,但它无法替代的是:人类面对艺术作品时的战栗,审美体验中的生命感通,以及对“何为美好生活”的价值追问。这些属于人文精神的维度,恰恰是技术最难以“优化”的部分。历史的经验一再

证明,传统美学中那些真正属于人类精神的内核,在技术的冲击下反而可能被更清晰地辨认。未来美学的生机,不在于拒绝技术或拥抱技术,而在于在技术与人文的张力中守护那份对真实的敬畏、对深度的追求、对意义的追问。当“真实”成为奢侈品时,辨别真伪的能力便成为真正的自由。当算法塑造审美时,独立的判断便成为最后的尊严,而这正是美学在数字时代不可替代的价值。面对这场千年未有的变局,我们既不能以怀旧姿态拒斥技术,也不能以技术乐观主义消解人文精神。唯有以开放心态拥抱变革,同时以批判眼光守护真实、深度与意义,方能在数字洪流中,让美学之树焕发新的生机。

注释

①转引自[日]宫原照夫:《多媒体商业成功的关键》,陈旻译,《中国电子出版》1998年第2期。②林书:《是“Seedance 时刻”,但字节的野心可以更大些》,参见微信公众号“最话 FunTalk”,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5NTczNTkyOA==&mid=2247493896&idx=1&sn=6477ab7d5c5f2f9e2404041b3cae8259&chksm=c18fd1802c579fc4cc87b065318932035d8f3eaea7533c9dae160182493e6a6d8625b54ce72e&scene=0&xtrack=1#rd。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陈定家.网络时代的文学转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148.
- [3]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M].何道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205.
- [4]稻见昌彦.超人诞生:人类增加的新技术[M].谢严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9-10.
- [5]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6.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 [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 [8]詹琰.虚拟空间中的“读图时代”:技术引发的美学变革[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5):8-13.
- [9]刘晨.跨学科的开拓性文图研究:评《中国文学图像简史》[N].文艺报,2023-06-16(08).
- [10]赵宪章.文学与图像研究:新时代的新实学[J].文艺论坛,2022(1):25-27.

- [11]杨向荣.图像转向[J].外国文学,2015(5):110-118.
- [12]汪正龙.图像时代的文学变异: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演变及其理论思考[J].学术月刊,2019(10):132-138.
- [13]赵宪章.中国文学图像史若干问题[J].民族文学研究,2022(6):5-14.
- [14]陆扬.图像与视觉文化[J].甘肃社会科学,2023(1):54-62.
- [15]张伟.图像霸权的审美祛魅:论现代视觉文本的范式构建与互文表征[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107-112.
- [16]魏则胜,苗存龙.视觉文化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图像化传播[J].贵州社会科学,2021(1):35-41.
- [17]龙迪勇.模仿律与跨媒介叙事:试论图像叙事对语词叙事的模仿[J].学术论坛,2017(2):13-27.
- [18]周子渊.图像与眼睛:读图时代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J].中国编辑,2019(8):21-26.
- [19]常江,罗雅琴.理解Sora: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模态与公共美学[J].南方传媒研究,2024(6):14-22.
- [20]胡汕.Seedance2.0让技术与权利的弱平衡再次被打破[EB/OL].(2026-02-12)[2026-02-22].<https://opinion.dahe.cn/2026/02-12/2054921.htm>.
- [21]战钊.Seedance2.0出圈,AIGC面临共性挑战[EB/OL].(2026-02-24)[2026-03-07].https://tech.gmw.cn/2026-02/24/content_38604863.htm.
- [22]徐杰.人工智能电影的主体性状况及其审美批判[J].中国文艺评论,2025(5):89-101.
- [23]周游.是时候“颠覆好莱坞”了?[N].中国新闻周刊,2026-02-24(02).
- [24]CHOW P S, CELIS B C. The cloak of creativity: AI imaginaries and creative labour in media produc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25. <https://dx.doi.org/10.1177/13675494251322991>.
- [25]陈舒盈.算法逻辑与符号重构:数字时代AI图像叙事的文化表征与批评实践路径[J].当代美术家,2025(5):144-154.

The 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Principles by Digital Media

Chen Dingjia

Abstract: As the digital wave surges forward,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unprecedented in a millennium. From the printing press to digital media,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resembles a great river changing its course. Big data weaves the narrative fabric; virtual reality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percep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hapes th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causing the walls between artistic genres to crumble—film and game merge, literature and code dance together, and diverse aesthetic forms emerge. In the era of image hegemony, “aesthetic disenchantment”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position. The rise of visual culture has shif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and image from harmony to tension, and from conflict to reconstruction. New media are profoundly transforming people’s “aesthetic expectations.” New technologies not only weave dreamlike visual narratives but also immerse audiences in interactive theaters, while social media turns everyone into an aesthetic subject. Cross-modal deep learning continually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aesthetic;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allow beauty to engage;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pushes aesthetic objects into everyday life. However, the problems brought by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cannot be ignore—shallowness dissolves depth, fragmentation tears apart wholeness. “Boundary-crossing” and “becoming an instant hit” are not only outcomes driven by technology but also the very source of the everlasting development of the life of aesthetic. As the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of AI approaches, traditional aesthetic concepts are undergoing a fundamental reconstruction. Only by embracing this transformation with an open mind can aesthetics flourish with new vitality amidst the digital revolution.

Keywords: boundary-crossing; instant hit; image hegemony; cross-media narrative; generative AI; digital aesthetics

[责任编辑/漱玉]